

本书出版后连续六个月雄踞德国新书最畅销书榜首。作者维比克·布吕安——主人公的女儿，通过对家族资料的搜寻、阅读和整理，生动地描述和再现了一个世袭商业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波三折的命运，以及她情感上、政治上同自己家族激烈的交锋。她娓娓的叙述方式让遭受同样命运的德国同胞们深受感动。

● [德国] 维比克·布吕安/著 朱刘华/译

Wibke Bruhns

Meines Vaters Land

我父亲的祖国 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東方出版社

I516.55/3

2008

Meines Vaters Land

我父亲的祖国

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德国] 维比克·布吕安/著 朱刘华/译

Wibke Bruhns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父亲的祖国 / (德国) 维比克·布吕安 著 朱刘华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060-3191-2

I. 我… II. ①布… ②朱… III. 纪实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793 号

我父亲的祖国

著 者: (德国) 维比克·布吕安

译 者: 朱刘华

责任编辑: 陆丽云

特约编辑: 方 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网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版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版

200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21 千字

书号: 978-7-5060-3191-2

定价: 39.80 元

序

我发现了父亲汉斯·格奥尔格的一张照片。他的相册和信封里有数百张照片，还有些照片散见于日记、证件和信函中。这其中有童年的他，有身穿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服年轻英武的他，还有作为丈夫、商人和父亲跟我们这些孩子们欢聚的他。母亲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许多小相框，其中一只相框里有一张父亲的照片。

母亲埃尔泽过世后我带走了三张小照片：一张是头戴花边帽的外祖母；一张是身穿猎装的父亲，他坐在哈尔伯施塔特的沼泽地上，面前是一只猎获山羊；另一张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身穿白衬裙，脚着轻便鞋，腿上套着长筒丝袜。15年来，这三个人——一个风趣迷人的老太太、一个心满意足的猎人、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一直在我书桌上从珍贵的小相框里冲着我微笑，可望而不可及。我将它们搁在那儿就是因为这些珍贵的小相框，因为它们曾经摆放在母亲的卧室里。

现在，小埃尔泽从相框里滑落下来了，当我打开相框要将她重新放正时，父亲与我打了个照面。母亲将他藏在她孩童时的照片背后，那是个30岁左右的男子，除了最后那张摄于人民法庭门外的照片之外，他未曾有过如此沮丧透顶的神情。我将小埃尔泽的照片插在这张照片之前，因为我无法长时间面对他那张绝望的脸。母亲或许就是因此才用她对童年的回忆来掩盖那张照片的。她的照片肯定是摄于1900年前后，当时她还不足两岁，倍受家

人的呵护、关怀与宠爱。当时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只是无法料见后来真正的详情。

母亲为什么剪下年轻的丈夫的一脸沮丧，镶进美丽的椭圆形小相框呢？汉斯·格奥尔格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俩的生活还是笑声盈盈。他们的敏捷俏皮和幽默诙谐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母亲是什么时候换掉照片的？是在他死于普勒岑塞之后吗？还是在那之前，当长年战争的分离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彼此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职，共性却被磨灭了的时候？或者是在父亲欺骗母亲的时候呢？

我连续数月钻进一种陌生的生活里，钻进这些信件、日记和我从有众多分支的家族墓穴里搜集起来的一百多年历史的文献之中。克拉姆洛特家族历史悠久，一直自诩为氏族，虽然家族成员引以为自豪的中心——哈尔伯施塔特——早已毁于战火了。我所阅读到的内容并不全然陌生：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我不认识他们。父亲30年代就有一架16毫米的相机，用来拍摄家族的活动：在哈尔茨山里狩猎，在花园里玩滚球戏，那些大孩子和当年的小孩子们在荡秋千。不久前我得到了这些照片的数字版，我认出了照片上能见到的每一位，虽然我跟许多人素昧谋面，或仅在孩提时见过。

我看到了燕尾服——天哪，那是怎样的燕尾服啊！——和那些穿着华贵时装的夫人们。我思忖母亲为什么穿得那么没有品位，她不是有个名叫苏莉·沃诺的女裁缝吗？她的高雅在哈尔伯施塔特可是首屈一指呢。在闹婚之夜和祖母格特鲁德的六十大寿庆典上，他们组织了华丽的演出，由“伯瑙夜莺”登台演出——这是一支演奏适合家庭专用的说唱谣曲和街头俚曲的乐队。我的书橱里还存放着街头俚曲和叠韵诗集呢。多么陌生的生活。

我发现了父亲坐在钢琴旁的照片，他总是唱歌，这个家族的人都会唱歌和乐器演奏，多声部，一曲接一曲。父亲轮番演奏小调、大合唱和六弦琴，那许多的家庭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但我并不熟悉他的声音，我觉得压根儿就没有听过他的声音，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他肯定对我这个小姑娘说过什么。当他战争期间回家探亲时他也肯定给我唱过歌。

我也不知道身为我父亲的这个男人是怎么讲话的。我正在设法整理他的生平，这事现在很重要。他也跟我一样，双手动个不停、嗓门很大、容易激动

吗？他文字颇丰，思路敏捷；无论是句子结构还是单词拼写，他从不写错，打字时也不出错，更不要说是在他的脑海里了。总的说来很快活。他的字体，无论是聚特林体^①还是拉丁字体，虽小但能看懂。父亲写字像我的祖父——他最尊重的人。光是他们两人整理相册的方式就很相像——在每张照片周围用白墨水画上细框线，写上细细的字句。

而母亲是个头脑糊涂的人，字母大如斗，忽上忽下，上涂下画的。倘若让她填一份表格，她的字就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狗一样上窜下跳的。家里有一家家庭明细账簿，记载着1938年至1943年的家庭收支和消费。当时他俩轮流记账，父亲的数字写得端正笔直，没有计算错误，没有一丝疑问；而母亲的字跑出了格子，一大堆的问号和注解，战后很多年了，她都没能克服这种计算方法，总也写不对，弄得她自己越来越绝望，她也期望能把字写工整呀。

母亲也写了很多信，在信里，她叙事毫无逻辑，语法和标点使用混乱，满页都是令人不解的更正。她说笑就笑，说哭就哭。一会儿是对经常外出的女儿们进行道德说教，一会儿是对她纷繁复杂的事务的描写，作为一个宾客盈门的大家庭管理人的角色，她总是乐于表现。这两种叙述总是混杂在一起，纠缠不清。

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使父母总是能从中获得取笑对方的乐趣，两人经常大笑不止。多少年后，当我将母亲当成普通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来看待时，我却发现母亲是个充满激情、多愁善感的女人。她情愿自己早就死去了，当她不必再照顾自己那5个孩子时，就失去了生活仅有的一点乐趣。多年前，在我刚出生的日子里，我的父母亲曾快乐无比，父母的朋友们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当年他俩的故事，以及他们聚拢人心、将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能力。

我认为，孩子们关心他们的父母，只是将父母当做财源而已。这种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呵护、供养和资助”为基础的，至于谁是父母，他们有何感觉，他们是否幸福，“我”并不在乎。朋友们所认识、热爱和陪伴过的那个人，“我”并不认识。孩子们并不了解父母，直到他

^① 1935—1941年在德国学校使用的德语手写体。

们去世之后——也许——直到询问不再意味着轻率和越轨之后。孩子们，包括我的孩子们，将对所有的温情保持疏远，他们在寻找这种疏远：父母的过度关心始终是对孩子们的一种威胁。

90年代初，我还不能真正地理解父母，过去，我不愿让母亲包揽我孩提时的的问题，现在，仍不愿她干涉我成年后遇到的种种问题。她每次都很激动，意识不到自己并不能胜任，结果是我的孤独，她能改变这种现状吗？我替父亲寻找过一个明确的位置：我不认识他，因此他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没有想念过他，我们这一代的成百万女儿都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不让他纠缠我，也不想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是一道裸露的伤口。我了解的他就是她的损失，她对此缄默不提。我今天知道了，许多“7·20事件”的寡妇都对孩子们保持了缄默；这是一种禁止提问的缄默，双方都在回避这一过分的要求。

1979年我准备移居耶路撒冷。我乘车南下，乘船从安卡拉前往海法^①，在港口办理入境手续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东方国度。我在希伯莱大学附近的斯科普斯山上找到一座能远眺喀斯特荒地的房子。再往南是一座阿拉伯村落。孩子们就读的英语学校100年前是一座英国至公会教会医院，当我第一次穿越宽敞的花园、走过夹竹桃树篱和无花果树林时，我认定女儿们在这里学不学数学和语言无关紧要。磨损的台阶和斜砌的沙石岩墙，茂盛的天竺葵，来自40个国家的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求学时代留下光辉的印记——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在西约旦的希伯伦调查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历史。在这里我了解到了一些生活常识：阿拉伯居民跟来自基尔亚特·阿尔巴的以色列移民之间的深仇大恨。我与房东一起熬过了一次“宵禁”和长达数日的戒严，我不得不上街为多口之家购买食品。商店大门堵死了，我从后门进去，看到那些移民区的年轻人狂妄地拿着长面包和熏肠逛大街。耶路撒冷的每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当时各民族和宗教还差不多和平地相处着，我钻进人群，钻进市场里的

^① 位于以色列西部沿海北端海法湾南岸进口处，濒临地中海的东侧，是以色列的最大港口。它是以色列北部的交通和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的铁路枢纽。

嘈杂声，享受着陌生人感人的关注。我也因为移民问题与当局往来，为对我的委任而奋斗，办理像开两个通存通兑户头这样简单的事情。在那整整六个礼拜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在为我的那些骄生惯养的孩子们担忧，他们一个12岁，另一个才11岁，能够平安地从安逸的汉堡移居到异国他乡吗？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

有一次保姆在电话里告诉我，电视里播放了“7·20事件”的纪录片，我便请她下次播放时录下来。当我乘飞机返回时，航班晚点，机场拉响了空袭警报，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在飞机上，一群东正教犹太人站在过道里大声祈祷，他们头上的黑帽子罩住了两鬓的鬃发。我惊讶地打量他们祈祷时使用的规范道具：身披祈祷大衣“塔利特”（Tallit），额头和胳膊上扎着“特菲林”（Tefillin）布条。我也对他们摇晃的上身感到惊奇。我必须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在深夜抵达汉堡后，我亲吻了睡眠惺松的孩子们，听他们向我讲述我在国外时他们的生活情况。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三点，我疲惫不堪，喝了杯威士忌，试图适应红木家园和那座将成为我新的家园的千载圣城之间的反差，前者井然有序，而后者野蛮、混乱。

电视机上有盘录像带，我将带子插进录像机。电视机里出现了我的父亲汉斯·格奥尔格站在人民法庭上的短暂镜头。他站在那里，腰板笔挺，身穿肥大的西服，垂头丧气，表情木然，只有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在咆哮。我看见自己坐在那里，不知所措。那已经过去35年了，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35年前，我父亲45岁，比坐在如今汉堡的这张沙发上的我只大了不足5岁。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时的德国大部分都已沦为废墟。1944年战争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虽然它还痛苦地拖了一年。属于父亲们的时代结束了。似乎德国人将永远不能战胜那些灾难和羞辱，他们将用失去未来偿还他们的罪孽。

短暂的35年。我回来了，电视里那个濒死男人的最小的孩子，刚刚结束一次精彩的远东之旅回来了——偏偏是自一个犹太人的国度回来了！我用波希米亚的水晶杯喝着威士忌——我的周围是书籍、画册和漂亮家俱。35年后，我又一次注视着那个面无表情的男子——拍完这张照片后的第11天他就死了，

被绞死在普勒岑塞监狱里的挂肉钩上。我不认识他，他在我的记忆里连个影子都没有留下。战争爆发时我还不足一岁，从那时起父亲几乎从不在家。但我在他身上认出了我——他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我知道，我长得很像他。我掐了掐自己的小臂：没有他就不会有这皮肤。没有他就不会有我。关于他，我知道些什么呢？我一无所知。

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因为这个家庭对那些年的事情讳莫如深。为什么没有人去追寻父亲的踪迹呢？孩子们榨取父母：要求食品、温暖、娱乐、安慰、保护，尤其是爱，而我的父亲却不在此列——事情是这样的吗？这可能适用于当时年仅五岁的我。可当他去世时，我的兄弟姐妹们差不多成年了——他也不值得他们谈论吗？不对。作为传说。他们一再地讲述有关父亲的笑话、他的迂腐的轶事。总是爆发出专为父亲保留的亲切的大笑。

而我面前电视机里的这个男人并非传说。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站在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厅里，周围是身着制服的听众，他知道不久之后他将恐怖地、极其孤独地死去。却被要求沉着、勇敢。事后说他们死得“很有男子汉气概”。天哪！这真是匪夷所思。得有人牵着你的手，陪你到普勒岑塞的刑场，因为直到那里你还活着——谁还知道这些呢？在今天你的名字悬挂于柏林高等法院或国防部、普勒岑塞或哈尔伯施塔特的纪念牌的背后，你的名字出现在像克拉姆洛特图书馆那个K字头条目下的图书背后，但是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你的死亡阻断了我的感觉，你不仅是汉斯·格奥尔格——一个“7·20事件”中的英雄。你也不止是我母亲心中小心翼翼绕过的伤痛。我不会绕过你，我想要你，我是你的孩子啊。在从耶路撒冷返回的那天夜里，我发誓：我要来关心你。

我当然问过他们——问过母亲，问过曾经认识你的其他人。但这已经太晚太晚了，语言规则已经形成了。在国家悼词中，你被称为抵抗运动的英雄。母亲私下将她的生活划分成两部分：半生无比风光，半生是强制劳动。她默默地忍受着前者的失去和后者的艰辛，从不把悲伤向孩子们宣泄。直到几十年后，当母亲需要女儿们照顾时，我才理解了她曾将她全部的悲痛倾泄于我大姐身上，这始于这样一个事实：1944年，埃尔泽要21岁的女儿——当时的化学系大学生——为我们大家去搞毒药。

当母亲被倔强的、处于青春期的我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她就拾出父亲吓唬我，说：“要是你父亲还活着，你绝对不敢这样！”当我那疲惫的母亲援引这毫无效用的证据吓唬我时，我轻蔑得直呼哧。费尽心血、心力交瘁的母亲啊，你如果告诉我，这些我今天才知道的事实就好了：你的婚姻破裂；父亲欺骗了你；在最初几年里都曾崇拜希特勒；而你也“勇敢”无比，在这到处存在的行为里你从未能喊出对死亡的惊骇，也不能哭出你们共同生活失败而带给你的悲伤。

我感激母亲没有告诉我这一切。否则我将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使他变得无懈可击，而母亲是那个我想爱她、却因为自己的缘故跟她发生摩擦的亲人。如果必须在他俩之间进行一种选择，我将无法应付她的心灵的废墟。我不想怜悯她。母亲是我年轻时的榜样，我就是在这个榜样身旁成长起来的，我用这个榜样来检测我自身的力量。

父亲汉斯·格奥尔格于1944年8月26日被处决，他是跟其他人一样，身穿囚服，双手捆在背后，光脚趿拉着木屐走去普勒岑塞监狱的“行刑房”的。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气温32度，天空几乎没有云彩。死刑定在12点44分执行，柏林夏洛滕堡户籍登记处登记的是“根据家住柏林曼陀菲尔大街10号的助理看守保罗·迪尔豪尔的口头报告”。还记载了，报告人“很有名并声称他是亲自了解死亡报告的。”我未能询问保罗·迪尔豪尔，他于1976年去世了；我也没必要问他。户籍登记员格卢克于1944年8月28日“代理”签写道：“死亡原因：绞死。”

是搞错了？如果是的，那又是谁的错？汉斯·格奥尔格和埃尔泽两人都是纳粹党员，汉斯于1933年加入，埃尔泽在1937年加入；汉斯是党卫队队员，埃尔泽是纳粹妇女联合会地方小组负责人；埃尔泽在入党申请书中确认她有“德意志-雅利安血统，而非犹太或其他种族”，表格上她的签字虽然歪歪斜斜，却像往常一样充满自信。

“铤而走险者必自亡。”这是《旧约》里说的。除了我的父母，肯定还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体验了这番痛苦。他们理解了危险首先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他们自己吗？埃尔泽最初没有理解。她为每个孩子写一本从出生到接受坚振礼的日记，1947年她还在日记里写道：“我万分恐惧地目睹着无意义的破坏

和民众的牺牲，只因为一个男人太胆小，不敢承认他失败了。”一个男人？失败了？难道一开始不就是群魔乱舞吗？

埃尔泽可不这么认为。1942年她兴高采烈地给东线的一位朋友写信道：“长驱直入，距离斯大林格勒80公里！我们到达了那儿，钳子合拢了！”同年，她在一封礼拜天信件中说：“倘若我们真的来到亚历山大，那英国舰队能去哪儿呢？如果它们被迫离开，地中海就属于我们了!!!”属于我们？就是这么回事。事关生存空间。汉斯·格奥尔格在1942年从俄国前线写信，说必须争取被征服的民众，“若要领导一个民族，就得掌握该民族的语言，否则他就得不到民心，必须在精神上征服它，这是靠奴役肉体所达不到的！”但他不怀疑“奴役”的合法性和领导权。

汉斯·格奥尔格是何时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漩涡之中的？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第三帝国的可怕错误的？他又是何时认识到自己是被骗了的？人民法庭的判决书称，汉斯·格奥尔格于1944年7月10日获知密谋活动，却没有告发参与者，因此被判处绞刑。但判决书也说，他和他的女婿伯恩哈德·克拉姆洛特是六个被告中距离“谋杀事件最近的”人——这怎么吻合得起来呢？

我不知道真相。有许多迹象表明，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反谍报员，汉斯·格奥尔格骗过了卡尔滕布鲁纳^①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审讯人员，他和“7·20事件”的其他一些人一样，直到被处决前夕才暴露出来，这一次他彻底输了。他所认识的密谋分子太多了，不可能直到暗杀行动前10天都一无所知。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候补军官培训班上就结识了，如沃尔夫-海因里希·赫尔道尔伯爵、米夏埃尔·马图契卡伯爵、汉斯·格奥尔格叫他“叔叔”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以及他像慈父般的朋友对待的阿克西尔·冯·登·布舍；汉斯·格奥尔格一生都在维护友谊、联系和网络。

盖世太保和法庭在审讯时指控20多名密谋分子参与迫害犹太人、“在波兰的谋杀”、处置战俘及占领区平民百姓；他们还参与了军事抵抗。

^① 1903—1946年，纳粹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

这批军官想避免第二个凡尔赛和约^①，反对无能的希特勒充当最高统帅；他们关心的是一个可以忍受的战争结局，而不是偿还那永无止境的债务。德意志版图的大小、德意志的声誉受到威胁，他们发觉德意志的旗帜被玷污了。

军方认为卑鄙的行为乃他人所为，而德国边防军是清白的。难道不是吗？赫尔穆特·科尔^②还曾经不厌其烦地大谈“以德国的名义所犯的”错误，像是头脑发热，黑白红^③三色旗冲锋在前，谋杀、抢劫、毒杀、没收财产、蹂躏紧随其后。源于外星球的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民族，果断地灭绝“劣等”种族，叫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全世界属于我们。”

然而，汉斯·格奥尔格没有，他没有叫嚣，他只是歌唱，但他做了他所做的一切，为了“我们孩子的美好未来”。在哪儿呢？在这个“污秽地方”吗？他就是这样称呼俄罗斯的。到底为什么？孩子们都很好，他也很好。他还想要

①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之一。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郊凡尔赛宫签订，1920年1月10日生效。签字国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汉志（今为沙特阿拉伯一省）、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暹罗（今泰国）、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等战胜国为一方，战败国德国为另一方。美国代表虽签了字，但因参议院未批准该和约，故签字无效。和约包括15部分、440条约文和1项议定书。主要内容有：1、国际联盟盟约。2、关于德国的疆界。3、关于德国的境外权利和利益。4、关于德国的军事。5、关于德国的经济和赔偿。6、关于德国的战争责任和审判。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巴黎和会，和约却规定将德国霸占的中国山东省的铁路、矿山、电讯设备、胶州湾地区的租借地及其他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屈辱性规定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② 生于1930年，少年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斗。1947年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来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69—1976年任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后任当时为反对党的基民盟领袖，并进入德国联邦议会。1982年10月11日，科尔通过不信任投票的手段战胜对手赫尔穆特·施密特成为总理，直至1998年。1973—1998年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科尔也是战后唯一一个通过不信任投票的方式上台的德国总理。1998年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10月27日，科尔的总理职位由格哈德·施罗德接任。科尔是俾斯麦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

③ 从1871年到1918年以及从1933年到1945年的德国国旗颜色。

什么？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朋友们规矩正派；身为一
名正直的德国人他本人游遍了半个大陆。当我11岁那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
学校里被一些不可以和德国孩子一起玩耍的孩子扎伤时，他是否在云端上方观
看着呢？在丹麦或瑞典，旗帜和国家不必成为羞愧的理由，在圣诞树上悬挂小
国旗，这在那里是很普遍的事情，当我们不能像丹麦和瑞典那样在圣诞树上悬
挂小国旗时，他是否懂得我的忧愁呢？当我在以色列做了记者、艰难地学会战
胜我的国家时，他在我的身边吗？

“走吧，维布克，我们去见父亲，求得父亲的宽恕。”大姐最后坚决地要求
我道。这是她1990年去世前夕的事情。40多年来她替代死去的汉斯·格奥尔
格留在埃尔泽身旁，她整理、平息和弥补母亲一生中遭遇的风暴所带来的损
失，一次次地将失控的弟弟妹妹们领回正途。她本人和她的未来被这个家庭的
要求埋没了。现在她只想要至高无上的汉斯·格奥尔格——那个被杀害的父亲
饶恕她。

什么？为保险起见，我追问她：她指的是上帝还是父亲。没错。他要他。
他的宽恕、仁慈的上帝啊，或者随便哪个神灵，我为我不必这样做感谢你。我
可以观察父亲，我可以设法理解他，或许我会爱他，我很想安慰他。我很走
运，我不需要他的宽恕。

我不必做决定，这就是幸运。我没有穿少女队队员^①制服。我唯一不得不
忍受的衣服是那样难看的小红帽服装：那是战后用卐字旗缝制的。我从来不必
去相信那些我所反对的事情。我会反对吗？整整一代人先于我经历了一些我
一生中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有父辈们的遗产都被没收了，而我却逃脱了，
不必从属于那个集体。

大姐没有。阅读她的日记时一股愤怒的同情将我侵袭。1944年11月，
21岁的她写道：“我不能离开他，不能离开我对他的信任，我曾经为他服
务，我想终生为他服务。我很大程度上属于杀害我父亲的那个人，还没敢
形成过半点反对他的念头。”不久之后她又写道：“我的元首，我是最忠诚
的人之一。我还没有离开过你，我的元首——我还在希望，站在你面前，

^① 德国纳粹时期希特勒青年团下由10岁至14岁女孩组成的少女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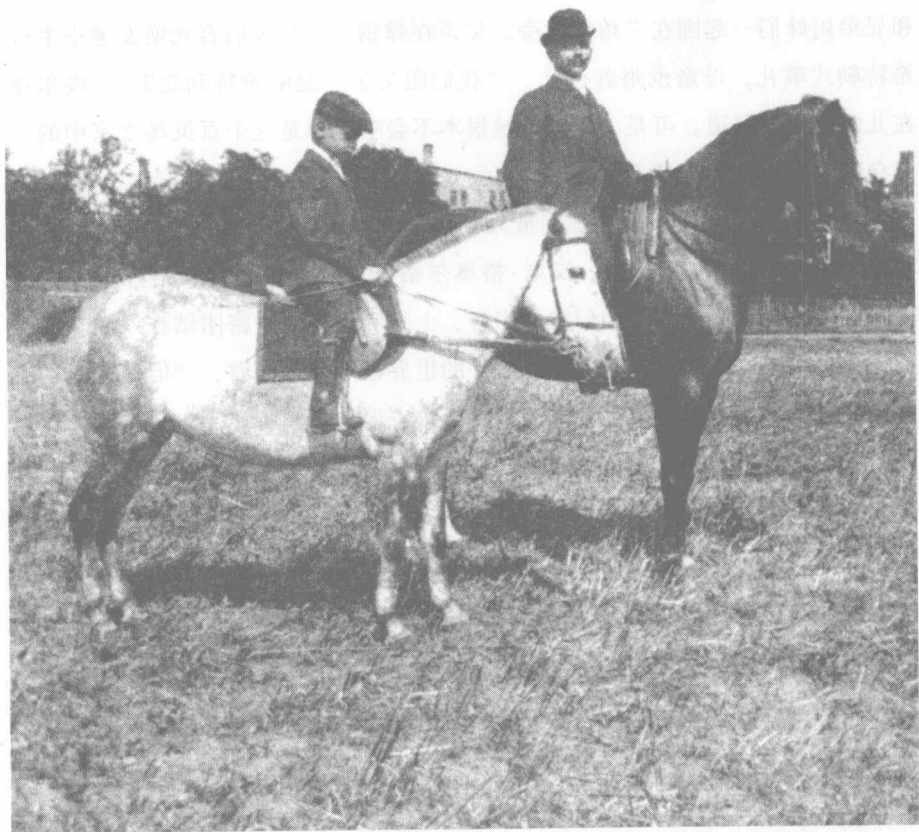
被你的目光所吸引，你想命令我什么就命令我什么吧，我将为你而死。”然后：“我相信过也被骗过。我为魔鬼工作过——我爱过，我的元首！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会恨……一种狂热的恨，它也是狂热的爱。仇恨和消灭那个毁了我们的人，如果我必须死，那么我要死在反对你的斗争中！你这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尽管我读出了并非姐姐独有的激情和狂热的奉献精神，我在这背后没有发觉什么能不让这个年轻女子陷进去的东西。1933年10月，11岁的她跟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围在三角钢琴旁。父亲在弹钢琴，孩子们容光焕发地举手行希特勒式敬礼，母亲也跟着行礼。“我们跟父亲一起唱希特勒之歌。”埃尔泽在儿童日记中写道。可是，见鬼，她根本不会唱。她是这个百灵鸟之家中的一只乌鸦，唯一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这些日记里经常谈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振奋人心的时代”，谈到希特勒审时度势的“天才直觉”。汉斯·格奥尔格发自东线的礼拜天信件中多次描写，领袖在电台里的演讲如何将“军官、士官和士兵”紧密团结在一起，即便是在敌机扔下的重型炮弹面前。阵地外的世界被炸成了废墟，“但是，元首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所有人纹丝不动、专心致志地侧耳倾听。”

孩子们也收到了这样的信，打字机打印了9份，每个孩子人手一份，每个礼拜都让大家确信，周围一切正常，平安无事：包括我的最小的姐姐——父亲死时她才11岁。1947年，当母亲向她描述暗杀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时，话中还充满着同情：“对你说来是最艰难的时期；你们是在爱戴和钦佩希特勒的教育中长大的；你十分爱你的父亲，这怎么协调得起来呢？”对啊，怎么协调得起来呢？埃尔泽以一系列冲向深渊的满员列车为例向孩子们解释。“7·20事件”的那些人认为暗杀是还能够阻止列车的一种手段。而旁观者则觉得他们是要加速列车的坠毁，因此他们必定会不光彩地死去。但真正的荣誉在于试图阻止灾难发生，这一荣誉非父亲莫属。孩子得到了安慰，埃尔泽写道。

名誉，不光彩地死去，灾难。我们这些后辈为我们国家带给别人的灾难而烦恼。对于父母，灾难就是战败、瓜分及其后果。姐姐告诉我埃尔泽战后听说灭绝营事情时的反应。她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如灰，说道：“人家永远不会



父子俩一起晨骑

原谅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人，奥斯维辛^①——罪过。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一句也没有提到那些牺牲者。

我无法取得进展。我是谁啊，竟想在今天去理解过去的事情，并且进行判断？汉斯·格奥尔格和埃尔泽各自付出了代价。我不是要算账，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傲慢。“你们将从我们沉没于其中的洪水里钻出；当你们谈论我们的缺点、还有你们逃脱的黑暗年代时，请好好想想。”贝尔托特·布莱希特^②警告晚辈道。我不能在60年后无情地坐在这里，说“这是对的”。这一重大转折是我的幸运。当一切都停止之后，我却开始了。经历过这两者的那些人怎样了呢？他们应该像经常要求民主德国公民的那样，宣称他们生命中的头40年无效吗？他们应该永远忏悔吗？

这不可能。我要弄明白给后代造成如此伤害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为此我不得不追溯写下我的历史的那些人的历史，也就是回到家族的祖先身边去。我必须前往哈尔伯施塔特。

① 位于波兰南部小波兰省境内。1940年4月27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姆莱下令在此修建最大的灭绝人性的杀人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于同年6月14日将首批犯人运抵这里。1941年对集中营进行了扩建，二战结束时，整个集中营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除斯塔姆拉格、布热津卡、莫诺维采三个主要集中营外，还有45个分营。营内5个焚尸炉平均每天要焚尸10万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28个民族的400万人死于集中营，其中犹太人最多，达250万。1947年被开辟为国家博物馆。1979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② 1893—1956年，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1917年进慕尼黑大学学习文学，兼攻医学。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他被派往战地医院服务。革命失败后，继续大学学习，对戏剧发生浓厚兴趣。同年写出第一部短剧《巴尔》，攻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1920年完成剧作《夜半鼓声》。1922年写出《城市丛林》，并撰写剧评。1922年被慕尼黑黑小剧院聘为戏剧顾问兼导演。1924年应著名导演莱因哈特邀请赴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创作剧本《人就是人》。1926年，布莱希特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见解，初步提出史诗戏剧理论与实践的主张。创作有：《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1930）和《巴登的教育剧》、《措施》、《例外与常规》等教育剧。1931年，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舞台剧。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带着妻子儿女逃离德国，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1948年10月返回柏林（东）定居。1949年与汉伦娜一起创建和领导柏林剧团，并亲任导演，全面实践他的史诗戏剧演剧方法。1956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